

北宋官窯研究現狀的省思

謝明良
國立臺灣大學
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本文從研究史的角度回顧了歷來北宋官窯的研究情況。指出有關北宋官窯建置的宋代文獻只有兩筆，而宋元時期的汝窯記事亦僅十餘則。其次，與北宋官窯相關的瓷窯考古則包括河南寶豐清涼寺窯和汝州市張公巷窯。在這樣窘困的條件之下，當今學界有關北宋官窯的種種推論和比附，其實無一說可予證實或證偽。

宋元時期文獻所見汝窯是否即今日所俗稱的汝窯？已難實證。將傳世的一群優質青瓷命定為汝窯，且留下圖像可供檢證的最早案例是十八世紀的乾隆皇帝，問題是，影響及於今日的乾隆皇帝之判定是否正確無誤？同樣無從證明。

關鍵詞：北宋官窯、汝窯、寶豐清涼寺窯、張公巷窯

宋代（960-1279）是中國陶瓷史製瓷的高峰期，建都汴京（河南省開封）的北宋時期（960-1126）和以臨安（浙江省杭州）為都城的南宋時期（1127-1279），都曾設置官窯燒造陶瓷供宮廷使用。不過，北宋官窯研究仍有許多疑難未能解決，這包括北宋官窯的設置地點和汝窯是否為官窯？浙江越窯是否曾設置官窯或者只是如河北省定窯、陝西省耀州窯等作品般，屬進貢部分優質陶瓷予朝廷的民間窯場？一度被視為北宋官窯的河南省鈞窯的實際狀況又如何？本文的目的即是擬針對學界目前有關北宋官窯的研究情況，試圖從研究史的角度出發來省思此一課題。

從考古發掘和文獻記載等資料看來，由宋代官營作坊生產的陶瓷之種類不少，比如說《宋會要稿》〈食貨五十五〉「窯務」條載：「京東西窯務掌陶工為甗瓦器給營繕之用，舊東西二務，景德四年（1007）廢止，於河陰置務，於京城西置受納廠，歲六百萬，大中祥符二年（1009）復置東窯務」，指的就是設置於北宋汴京（開封）負責燒造建築磚瓦等陶器的官方作坊。其次，1990年代安徽蕪湖東門渡窯窯址及同省合肥市窖藏出土的帶有「宣州官窯」印銘的北宋時期青黃釉四繫罐，從印銘內容而言，應屬地方官營作坊製品（圖1）。¹另外，宋人李燾著《續資治通鑑長篇》（卷九十）載真宗時遣內侍與河南府「別造衣冠明器」，是官方亦製作可能包括陶瓷在內的入殯鬼器；從《大唐六典》載甄官署職司時稱「凡喪葬則供其明器之屬」，而其質材皆「以瓦木為之」，可知唐代的明器陶俑有的即出自將作監下甄官署所製作；秦始皇陵出土的陶兵馬俑亦為官造明器之著名實例。所以，如果依據作坊性質而言，上述陶瓷製品均屬「官窯」。

另一方面，以下所擬討論的北宋官窯，固然是由宮廷置窯、官方頒樣，於官營性質方面略同上述建築磚瓦、地方軍需或官製明器，但其具體的內涵主要則是指供內廷日常器用或儀禮，甚至兼具賞玩的施釉陶瓷製品，這也是當今中國陶瓷史學界所謂宋代官窯的主要內涵。換言之，依據此一約定俗成的官窯定義，則北宋時期曾接受官方委託燒瓷的定窯白瓷，²或曾經做為地方土貢進奉入朝的耀州窯青瓷，³以及宋徽宗著《大觀茶錄》所提到「底必差深而微寬」、「玉毫條達者為上」的建窯黑釉兔毫盞⁴等民間瓷窯場製品均不屬於官窯。

1 謝小成，〈「宣州官窯」探微〉，頁35-49；劉毅，〈「宣州官窯」及相關問題研究〉，頁78-85。

2 如《宋會要稿》〈崇儒〉七之六。載北宋宣和七年（1125）詔令罷減「中山府甗中樣矮足裏撥盤龍湯盞一十隻」。

3 如《宋史·地理志》或王存《元豐九域志》：「耀州土貢瓷器五十事」。

4 建窯詩文集成可參見：小林太市郎，《東洋陶磁鑑賞錄：中國篇》，頁181。

一、北宋官窯研究的回顧

涉及北宋官窯建置的宋代史料只有兩筆，其一是收入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九）的葉寘《坦齋筆衡》（以下簡稱《筆衡》），另一是同為陶宗儀編《說郛》所收之顧文薦《負暄雜錄》（以下簡稱《雜錄》）。兩書所載略同，但有小異，《筆衡》載「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雜錄》則稱：「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襲徽宗遺制，置窯於修內司」。《筆衡》約成書於南宋淳熙丁未（1187），《雜錄》係刊刻於景定庚申（1260）之後，兩書年代相距約六十年。問題是今傳涵芬樓排印張宗詳校一百卷《說郛》其實收有二十條題云六卷本之葉寘《筆衡》（陶珽重編一百二十卷《說郛》未收），但此六卷本《筆衡》並無北宋官窯相關記事，而「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之所謂《筆衡》記事，卻只是轉引自陶宗儀友人孫作序於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之《輟耕錄》所收輯的佚文。因此《筆衡》有關北宋官窯的記事是否確實出自葉寘手筆？其和《雜錄》相關記事是二或一？仍有待釐清。⁵無論如何，可確認的是，北宋「宣政間」或「政和間」已於京師置官窯，南宋修內司官窯之設立即是承襲「徽宗」或「故京」之遺制。

以往有關北宋官窯作品之比定，見解分歧，至今未有定論。從研究史看來，除了北宋官窯即汝窯問題較為複雜，擬留待下文另闢章節討論之外，另有諸多說法。比如說，大谷光瑞推測北宋官窯可能是一種薄胎厚釉的青瓷；⁶R. L. Hobson 也認為北宋官窯作品應與南宋官窯相近，⁷中尾萬三推測北宋官窯或是帶有「官」字銘的薄胎白瓷，⁸小山富士夫則主張北宋官窯即東窯。⁹後者小山說法喧騰一時，甚至於 G. St. G. M. Gompertz 亦採納其說，並將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一件今日證實係汝州市張公巷窯燒製的所謂亞歷山大碗，標示為「北宋官窯或東窯」（圖 2），¹⁰所以有必要略予回顧。該一說法先是依據前引《宋會要稿》（食貨五十五）「窯務」所載之「東窯務」以及

5 中尾萬三，〈南宋代に於ける陶磁の記文の略解 輟耕錄掲出「窯器」解〉，頁 1-14。Percival David, "A Commentary on Ju ware," pp. 27-28. 另外，《說郛》的版本學問題可參見：昌彼得《說郛考》，頁 187-188。

6 大谷光瑞，《支那古陶磁》，頁 53。

7 R. L. Hobson, *A 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 pp. 19-20.

8 中尾萬三，前引〈南宋代に於ける陶磁の記文の略解〉，頁 12-13。

9 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瓷史稿》，收入《小山富士夫著作集》上，頁 132-137。

10 G. St. G. M. Gompertz, *Chinese Celadon ware*, p. 107.

郭葆昌《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所收一件所謂「東窯」青瓷洗為線索，進而推測北宋官窯即「東窯」，也就是位於河南開封的「東窯務」，其具體風格為胎質不甚細膩的淡青釉瓷，有的還裝飾著剔花浮彫紋飾（圖 3），內蒙古遼永慶陵奉陵殿遺址曾採集到類似的標本。¹¹回想起來，小山氏東窯說的論證其實頗為粗糙，並有明顯之穿鑿附會，但其之所以會在二十世紀中後期備為一說，應該和日本出版事業發展蓬勃，而由日方發行的大量陶瓷史圖籍又對小山氏說法的引用不遺餘力一事不無相關。總之，所謂的東窯已隨著 1990 年代以來耀州窯窯址的發掘資料得以證實其多屬耀州窯製品（圖 4），另從紀年資料看來，此類製品的相對年代約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的北宋早期。¹²

釐定北宋官窯的另一著名案例莫過於所謂「官鈞」。眾所周知，施罩乳濁二液相分相釉的鈞窯，因釉含銅故呈現出一種藍色乳光或青中帶紅的色調，而以氧化銅為著色劑於還原焰中燒成的近似海棠或玫瑰的紅紫釉色，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大體而言，鈞窯可區分為兩類，一類屬碗、盤、罐等器皿類，窯址分佈於河南禹縣、臨汝等多處窯場，年代集中於金、元時期；另一類是俗稱的傳世鈞瓷，器形多為各式花盆（圖 5）、鼓釘洗或出脊尊等（圖 6），器底多鐫刻一至十的中國數目字，所謂「官鈞」即指這類製品。論者以為河南禹縣鈞臺八卦洞窯址所見該類標本伴出有「宣和元寶」錢範¹³（圖 7），故其年代可上溯北宋宣和年間。由於北宋徽宗曾修建「艮嶽」、「花石綱」廣羅全國奇花異木，所謂傳世鈞瓷花器即是為此一目的奉命燒造的，由於艮嶽始建於政和七年（1117），令諸路起運花石而完成於宣和四年（1122），故這類屬於徽宗御花園的專屬花器，實為北宋官窯。¹⁴儘管所謂「官鈞」的立論極為薄弱，完全只是一廂情願的猜想，諷刺的是，此一說法提出之後不但席捲 1980 至 1990 年代整個中國陶瓷史界，甚至影響至歐美與日本學界。羅慧琪 1996 年的論文即是針對此一積非成是的謬論所進行的全面性批判，該論文從研究史出發，廣徵博引，論證了傳世鈞瓷年代只能上溯元末明初，故其和「花石綱」完全無涉。¹⁵除了可從景德鎮珠山出土明初官窯及其他傳世作品的器形特徵，逕行推測傳世鈞窯花器、出戟尊的

11 謝明良，〈東窯小記〉，收入《陶瓷手記》，頁 333-340。

12 謝明良，〈耀州窯遺址五代青瓷的年代問題〉，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頁 55-77。

13 趙青雲，〈河南省禹縣鈞臺窯的發掘〉，頁 63。

14 李輝柄，《宋代官窯瓷器》，頁 38-52。

15 羅慧琪，〈傳世鈞窯器的時代問題〉，頁 109-183。

器式年代可能在十五世紀前後，¹⁶出川哲朗甚至將之特定在明初永樂年間（1403-1424），¹⁷近年，中國方面亦踏襲羅氏的論述，修正「官鈞」之誤¹⁸，深圳市的研究者亦在羅氏的研究基礎上另依據新收一批鈞臺窯遺址「鈞瓷」標本之器式，初步證實所謂「官鈞」之年代約於明朝永樂（1403-1424）或稍後時期（圖 8、9），而前引「宣和元寶」錢範背面因刻有年代要早於宣和（1119-1125）的「崇寧（1102-1106）年製」年號，故做為此前「官鈞」定年依據的該一錢範當屬偽作無疑。¹⁹我同意這個看法。

二、汝窯製品的確認和北宋官窯問題

宋代以降，到底是誰首次將一類多施罩天青色釉，主要以細小支釘滿釉燒成的優質青瓷判定為汝窯？就可供檢證的圖像資料看來，出身紹興性情乖僻的劇作家兼畫家徐渭（1521-1593）芍藥畫軸自題曰：「花是揚州種，瓶是汝州窯」；²⁰傳為大收藏家項元汴（1525-1590）晚年所作的《項氏歷代名瓷圖譜》亦載錄有「汝窯鳶尊」、「汝窯小圓觚」、「汝窯蕉葉雷文觚」等作品，²¹然而徐渭畫作下落不明，同時水墨花瓶之特徵應該不足以判明是否確為汝窯製品，至於所謂項氏圖譜其實只是晚清畫師臨寫自怡王府現已燒失的藏本，後由民國郭葆昌校注刊行的摹本，故原圖譜製作年代和所繪作品頗有可疑之處。關於這點，戴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業已為文指出前引郭校圖譜所收三件汝瓷顯然是以北宋《宣和博古圖》所收青銅器為摹本的偽書，²²迄今已為學界的共識。

入清以後，有關汝窯的記述極為豐富，個別作品甚至可和流傳至今的作品相對照，如《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雍正七年（1729）〈匣作〉所載「二

16 謝明良，〈十五世紀的中國陶瓷及其有關問題〉，收入前引《中國陶瓷史論集》，頁 232-236。

17 出川哲朗，〈官窯タイプ鈞窯磁器の製作年代について〉，頁 253-261，後又中譯題名〈關於官窯類鈞瓷的製作年代〉，收入《2005 中國禹州鈞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86-91。

18 秦大樹，〈鈞窯三問——論鈞窯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頁 80-92。

19 深圳市文物考古鑑定所，〈「官鈞」瓷器研究〉，頁 14 及頁 31。不過，河南省考古所相關人員至今仍頑強地主張禹縣窯址出土的刻有數目字花器為北宋時期製品，甚至再度宣稱「宣和元寶」錢範所示鈞瓷興盛於北宋徽宗時期一事，已「被眾多學者所認同」。詳參見《禹州鈞臺窯》，頁 172。

20 王士禎，《香祖隨筆》，卷十二，頁 229。

21 郭葆昌校注，福開森參訂，《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圖 19、22、34。

22 Percival David, "Hsiang and His Album," pp. 22-47.

十七日，太監劉希文、王太平交來洋漆箱一件，汝窯器皿二十九件」（圖 10），²³當中包括一件「奉華字圓筆洗」，²⁴我認為其極有可能即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件底陰刻「奉華」的汝窯平底小碟（圖 11）？可惜此亦不出推測之域。

另一方面，乾隆朝（1736-1795），更具體地說乾隆皇帝（1711-1799）顯然是做爲此一持論者，並且留下實物可供後人檢證的先驅。其次，1930 年代戴維德爵士則是以乾隆皇帝比定爲汝窯且鐫刻有乾隆御製詩的清宮傳世品爲線索，結合文獻記載再次論證汝窯外觀特徵，同時提出汝窯或即北宋官窯的關鍵人物。由於今日學界有關汝窯作品特色的常識化認識主要是基於上述兩位歷史人物的判斷結果，因此，欲理解汝窯命名的原委，就有必要回溯至乾隆皇帝形塑汝窯當時的歷史情境。這也就是說乾隆皇帝到底是透過什麼樣的文獻記錄或鑑定教養程序而得以掌握汝窯作品的實態？

從乾隆御製詩的內容及其所徵引的文獻看來，乾隆皇帝所掌握之宋元時期汝窯的記事恐怕和近代學者差別不大，爲便於討論，僅將我個人所知該時段汝窯相關記事全數羅列如下：²⁵

1. （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惟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
2. （北宋）惠洪《無學點茶乞詩》：「盞深扣之看浮乳，點茶三昧須饒汝，鷓鴣斑中吸春露。」
3. （南宋）葉寘《坦齋筆衡》：「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爲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
4. （南宋）顧文薦《負暄雜錄》：「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

23 朱家潛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頁 185。朱氏選編史料缺汝窯品名細目，詳細品名可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 068-194-586。

24 林柏亭主編，《大觀：北宋汝窯特展》，圖 33 及余佩瑾所撰寫的作品說明。

25 宋元時期汝窯記事參見：小林太市郎，《東洋陶磁鑑賞錄：中國篇》，頁 208-211。明代以來記事另可參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附錄二。另外，近年學界常見援引傳南宋人撰《百寶總珍集》所載市售汝窯的記事，本文因慮及其爲清代抄本，且部分行文又和明代《格古要論》內容相近，故在此予以割愛。

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爲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竈厚。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徽宗遺製，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

5. (南宋) 陸遊《老學庵筆記》：「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6. (南宋) 周輝《清波雜志》：「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末爲油，惟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
7. (南宋—元) 周密《武林舊事》：「(紹興二十一年張俊向高宗進奉) 汝窯酒瓶一對、洗一、香爐一、香合一、香球一、盞四隻、盂十二、出香一對、大奩一、小奩一。」
8. (南宋—元) 周密《雲煙過眼錄》：「汝窯爐一、瓶二、喎瓶二甚佳。」
9. (南宋—元) 周密《乾淳起居注》：「淳熙六年，太上皇後幸聚景園賞牡丹，剪好色樣者千朵，安置花架皆是水晶及天晴（青）汝窯金瓶。」
10. (南宋) 樓鑰《攻媿集》：「垂膽新甃出汝窯，滿中幾莢浸雲苗。」
11. (金) 趙秉文《汝瓷酒尊》詩「秘色創尊形，中泓貯綠醪，縮肩潛蠹蛭，蟠腹漲青甯。」
12. (元) 王逢《梧溪集》：「(汝甃觶) 本宋高皇壽成殿花瓶，御書遺刻尚在，既破而工人裁爲觶。」

就宋元時期文獻記載可以獲得的汝窯訊息包括：(1) 汝窯和高麗青瓷相近（文獻 1）；(2) 汝窯是宮中用瓷（文獻 5、6、9、12）；(3) 汝窯窯址在汝州，曾經受命燒造青瓷，其成品要比唐（河南南陽）、鄧（河南內鄉）或耀州（陝西銅川）等更勝一籌（文獻 3、4）；(4) 汝窯釉中含瑪瑙末（文獻 6）；(5) 朝廷揀退的作品可以交易出售（文獻 6）；(6) 民間富裕階層或官僚亦有收藏（文獻 7、8）；(7) 南宋時已極稀少，所以張俊才於紹興年間進奉汝瓷予高宗（文獻 6、7）；(8) 汝窯器式種類不少，有茶具（文獻 2）、香具（文獻 7）、酒具（文獻 7）和花器（文獻 9、10、12），缺損的花器可裁爲倣古器式（文獻 12）；(9) 個別作品有紋飾，如一件溜肩酒尊飾有龍紋貼飾（文獻 11）。另外，汝窯予人的一個整體印象是其屬高檔質優的青瓷。

問題是，除了北宋宣和六年（1124）徐兢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以及詩僧惠洪詩文屬當代人記當代事之外，南宋迄元代各文獻作者所謂的「汝窯」是否均出自汝州窯場？當中又有多少符合乾隆皇帝命定的「汝窯」？關於這點，學界其實一無所知。比如說我們就無法求證《清波雜志》所宣稱釉含瑪瑙末的汝窯，會不會只是

因汝州地區鈎窯曾經燒製天藍釉上帶玫瑰紫斑，外觀效果酷似瑪瑙的陶瓷，²⁶致使作者張冠李戴地以鈎爲汝，並想當然耳地創造出瑪瑙入釉的傳聞？總之，乾隆皇帝是如何地建構所謂汝窯之外觀特徵，並以此匡定出一群影響及於今日的汝窯製品呢？其實，試圖論定乾隆皇帝的汝窯鑑賞內涵，至少有兩條線索可齊頭並進且交互檢驗。其一是繪製於乾隆時期之帶有榜題的陶瓷寫實畫冊，再來就是乾隆御製詩文。

（一）陶瓷圖冊所透露的訊息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有清宮傳世分別題名爲《陶瓷譜冊》、《埏埴流光》、《精陶韞古》和《燔功彰色》等四本圖冊。圖冊均無紀年，不過余佩瑾經由圖冊畫頁之「古稀天子」、「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等鈐印，結合圖冊開數、裝幀特徵以及清宮造辦處檔案有關青銅、陶瓷譜冊的製作記錄，具有說服力地論證了四本圖冊乃是繪製於乾隆時期。²⁷我認爲《陶瓷譜冊》所收「宋汝窯蟠龍洗」（圖 12），從器形、紋飾以及口沿無釉等特徵看來，應即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南宋官窯「粉青雕龍圓洗」（圖 13），²⁸後者器底有澀圈一周露出鐵色胎骨，澀圈上方又有三處釘痕，而這正和譜冊作品下方題識所謂「底有環紋鐵骨，無釉，中排小掙釘三」之器底特徵完全一致，故可做爲乾隆朝以官爲汝的案例之一。

另一方面，《燔功彰色》也繪有兩件汝瓷，其一爲「宋汝窯碟」（圖 14），余佩瑾經由畫面作品下方「圈足底有三釘，中碾作尸識」題識內容以及作品圈足外牆的縮釉特徵，巧妙地比對出原作應即現藏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汝窯碟（圖 15）。其次，另一件「汝窯舟形筆洗」（圖 16）也因畫家寫實地描繪出作品口沿一處補金修繕痕跡，得以確認乃係英國 PDF 收藏（現歸大英博物館）之著名汝窯橢圓洗（圖 17）。²⁹關於這點，從畫作下方描述作品「中有如意暗花二」，而 PDF 汝瓷洗內底亦見頭部形似如意之陰刻相向鯰魚一事，可知余氏的比對正確無誤。

26 如調查河南汝州市東溝窯等窯址即採集到於天藍釉或豆青釉中帶玫瑰紫斑點的鈎瓷標本。見：馮先銘，〈河南省臨汝縣宋代汝窯遺址調查〉，頁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木森），〈河南汝州市東溝瓷窯址發掘簡報〉，頁 12-33 及彩版 7 等。

27 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頁 135-140。

28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宋瓷圖錄：南宋官窯〉，圖 46。

29 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頁 141。

（二）乾隆御製詩中的汝窯觀

在乾隆皇帝近兩百首的詠瓷詩當中，計有七首為詠汝窯詩，³⁰茲羅列如下以便參照檢索。

（1）乾隆四十二年（1777）

「汝州建青窯，珍學柴周式，柴已不可得，汝尚逢一二，是枕猶北宋，其行肖如意，色具君子德，晬而盎於背，髻壑雖不無，穆然以古貴，今瓷設如茲，腳貨在所棄（瓷有驚文斑點者謂之腳貨，語雖俗而切貼），貴古而賤今，人情率若是（葉）然斯亦有說，魯論示其義，大德不踰閑，小德可出入（葉），色潤瑪瑙油，象泯煙火氣，通靈旁孔透，怡神平底置，我自宵衣人，幾曾此安寐。」（圖 18）

（〈詠汝窯瓷枕〉御製詩四集卷之三十五）

（2）乾隆四十三年（1778）

「爲閣爲宮不可知，奉華兩字底鐫之，尺牘集裏傳名氏，見說風流女畫師（盤底鐫奉華二字，考宋高宗劉貴妃有奉華大小二印，南宋雜字詩吳焯所撰卷內有知是風流女畫師之句，註引畫史劉妃工畫人物云云，尺牘吳焯字也）」

（〈題汝窯奉華盤〉御製詩四集卷之五十一）

（3）乾隆四十四年（1779）

「定州白惡（去聲）有芒形（見輟耕錄），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堅銅以鎖，底完而舊鐵餘釘，合因點筆意爲靜，便不簪花鼻亦馨，當日奉華陪德壽（內府有汝窯盤底鐫奉華二字，考奉華乃宋高宗劉貴妃之號，妃善畫每用奉華印，此餅釉色製法與盤無異，亦刻奉華二字），可曾五國憶留停。」（圖 19）

（〈詠汝窯瓶〉御製詩四集卷之五十五）

（4）乾隆四十四年（1779）

「秘器仍傳古陸渾，祇今陶穴杳無存，卻思歷久因茲樸，豈必爭華效彼繁，口自中規非土匱，足猶釘底異匏樽，盂圓切已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

30 參見：郭葆昌，《清高宗御製詩詠瓷詩錄》，收入《說陶》，頁 295-323。

（〈詠汝窯碗〉御製詩四集卷之五十六）

（5）乾隆四十四年（1779）

「趙宋青窯建汝州，傳聞瑤瑤末爲油，而今景德（鎮名，陶瓷皆於此，有官窯民窯之分）無斯法，亦出自藍寶色浮。」（圖 20）

（〈詠汝窯盤子〉御製詩四集卷之六十一）

（6）乾隆五十七年（1792）

「餅亦罇之類，簪花勝酒斟（杜甫詩指銀瓶索酒嘗，李白詩玉餅沽美酒，是餅亦爲酒器，至舊瓷餅近多爲文房古玩，蓋以火氣全消，最宜插花，固較盛酒爲勝耳），虛傳瑤瑤末（六硯齋筆記云，汝窯用瑤瑤爲末作釉，當時止供御，殊不易得），實賴歲年深，穆若非英發，祺然足靜悒，不較繩繫耳，頓置擷芳尋。」（圖 21）

（〈題汝窯雙耳瓶〉御製詩五集卷之七十）

（7）乾隆五十九年（1794）

「西清三代富尊彝，越器晨星修內司，至理原非奇異事，銅堅瓷脆率應知。」

（〈詠汝窯盤子〉御製詩五集卷之九十二）

上述乾隆御製詩最早的一首做於四十二年（1777）乾隆皇帝六十七歲時，最晚的一首完成於五十九年（1794），其時乾隆已屆八十四歲高齡。詠汝窯詩雖僅七首，但因有將同一首詩鐫刻於複數作品之上，故傳世至今的鐫刻有乾隆御詩且經乾隆鑑定屬汝瓷的作品計有八件之多。從現有八件作品看來，有七件屬今日所謂北宋汝瓷（表一，編號 5、6、8、13、14、18、21），³¹另三件則包括一件清代倣官八方瓶，另兩件鈞窯瓷。其中，鐫刻《題汝窯雙耳瓶》之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八方貫耳壺係清代倣宋製品（圖 21），³²類似青瓷作品還見於大英博物館藏品，後者無御製詩，但

31 六件作品圖版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汝窯·官窯·鈞窯》，圖 2、16。李輝柄，《兩宋瓷器》（上），頁 8 圖 7；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A Collector's Vision: Ceramics for the Qianlong Emperor*, p. 12. Pl. 3；《出藍寶色浮：羅桂祥基金捐贈中國陶瓷》，頁 15、17。R. L. Hobson,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K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vol. VI, Pl. X.

32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宋瓷圖錄：南宋官窯》圖 11。

底有「大清乾隆年製」款（圖 22），³³可知兩者均屬乾隆朝景德鎮御窯廠倣古之作。我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故宮藏宋人李迪《鷄雛待飼圖》上題有乾隆御製詩，³⁴而同一首詩又見於乾隆倣李迪畫作一事不難推測：³⁵乾隆皇帝嘗以遊戲的心情將原本是吟詠宋畫或宋瓷之詩文，同時又書題或鐫刻在複數的清代畫作或陶瓷之上，否則實在難以想像乾隆皇帝會連他一手主導的官窯製品都無力辨識。

問題是，乾隆皇帝為何會將現藏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天藍色釉加施紫斑的鈞窯瓷枕視為北宋汝窯而予題詩歌詠呢？（同圖 18）³⁶其原因似乎不難理解，因為乾隆四十四年（1779）《詠汝窯盤子》提到：「趙宋青窯建汝州，傳聞瑪瑙末為油」；五十六年（1791）《題汝窯雙耳瓶》說「虛傳瑪瑙末」，儘管乾隆皇帝對汝窯瑪瑙入釉的傳聞似乎半信半疑，但終究還是援引明人李日華《六硯齋筆記》所記汝窯以瑪瑙為釉的傳聞以為詩注，而李日華此一記事即來自前引南宋周輝《清波雜志》（文獻 6）。另外，由於明末高濂著《遵生八牋》提到汝窯釉厚如堆脂，釉表帶棕眼，此一明代以來的汝瓷鑑賞觀無疑亦對乾隆皇帝將部分施罩失透厚釉且釉帶棕眼的鈞瓷視為汝瓷一事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換言之，乾隆皇帝因受到宋代以來汝窯以瑪瑙入釉傳聞的影響，而將外觀形似瑪瑙斑紋的鈞窯製品視為北宋汝窯，由於汝、鈞瓷釉調相近，所以又將原英國 PDF 收藏今日所謂汝窯之卷口碗刻上「題鈞窯碗」詩（圖 23）；同時將現今收藏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故宮的另一件器式相同的汝窯碗鐫刻上「詠汝窯碗」詩文（圖 24）。持平而論，汝窯和鈞窯於外觀上確有相似之處，也因此直到近年「汝鈞不分」仍然是學界常見的說法之一，比如說，大谷光瑞認為汝窯衰弱後陶工東移鈞州而為鈞窯，³⁷以及陳萬里認為鈞窯興起其實和汝窯衰弱密切相關之說法，³⁸即為其例。戴維德甚至依據其所收藏的一件汝窯火照贗品上的支釘痕，結合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倣鈞釉三犧尊主張早期汝窯曾受到鈞窯的影響；³⁹而汪慶

33 ダグラス・バレット等編，《東洋陶磁》5 大英博物館，圖 235。

34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9 冊，頁 89，京 1-322。詩文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景印祕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石渠寶笈（一）》，頁 516。

35 中國收藏家協會編輯委員會編，《北京故宮博物院盛代菁華展》，頁 108 圖 56。我要在這裏要特別感謝臺灣國立中央研究院石守謙教授的教示，他告訴我乾隆題畫詩中存在的上述現象。另外，我也要對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何傳馨研究員代為蒐尋相關資料致以謝意。

36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宋瓷圖錄：汝窯、官窯、鈞窯》，圖 84。

37 大谷光瑞，前引《支那古陶瓷》，頁 50。

38 陳萬里，〈汝窯的我見〉，頁 51。

39 Percival David, "A Commentary on Ju Ware," pp. 55-56.

正認為河南臨汝窯窯址發現的滿釉支燒鈎瓷標本為所謂「汝官窯」之前身的看法，⁴⁰亦可視為是戴維德說法的繼承。

除了上述八件刻有乾隆皇帝詠汝瓷詩文的作品之外，現存的汝窯製品當中另有十四件鐫刻乾隆御詩，十四件汝瓷詩題當中計十三件是吟詠官窯，另一則是前述詠鈎窯詩（參見表一）。如果總結詩文內容和現存作品所示瓷窯所屬，並參酌前引圖冊作品和題識，可以認為乾隆皇帝雖匡定出一批影響及至今日的「汝窯」，然而也往往將今日所認定的南宋官窯視為「汝窯」製品或以鈎為汝。其次，乾隆皇帝有關宋代官窯、汝窯的素養不僅得自前引宋元汝窯記事，且多受惠於明代後期文人藏家的相關著述，而後者知識脈絡顯然也是承襲自宋元時期的文獻記載。特別是明代高濂《遵生八牋》〈論官哥窯器〉認為汝窯「其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細小掙釘」，此一評論對於乾隆皇帝汝窯觀之形塑更具決定性作用，因為乾隆詠瓷詩中屢次提到的汝瓷特徵即是：釘底（細小掙釘）、厚釉（如堆脂）、色淡（其色卵白、堆脂）和棕眼，它和官窯的最大區別是後者多「紫口鐵足」，支釘呈銹色「鐵釘」，且釉層相對透亮。不過，應予留意的是乾隆皇帝或因《筆衡》、《雜錄》聲稱南宋修內司窯乃是「襲故京（或徽宗）遺製」（文獻 3、4），故而認定官窯產自修內司（乙巳年《詠官窯瓶》）⁴¹，同時又將修內司區分為北宋（壬申年《宋瓷臂擱》）⁴²和南宋（乙未年《詠官窯碟子》）⁴³。對於乾隆皇帝而言，北宋時確曾設置官窯（辛丑年《詠官窯小瓶》）⁴⁴，並且同意《老學庵筆記》（文獻 5）的記載主張其時京師有官窯（丙子年《詠官窯盤子》）⁴⁵，而汝窯是北宋時期設於汝州的青瓷窯（乙亥年《詠汝窯盤子》）⁴⁶。問題是汝窯雖非北宋京師官窯，但和鈎窯、定窯等名窯精瓷均和修內司有所關連（壬申年《宋瓷臂擱》）⁴⁷。我認為，乾隆皇帝之所以會有上述看似矛盾的認知，應該又和《筆衡》和《雜錄》「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

40 汪慶正，〈汝窯新議〉，《河南鈎瓷汝瓷與三彩》，頁 99。

41 御製詩五集卷十六，乙巳《詠官窯瓶》：「是器微有薛暴，然實宋時修內司物也。」

42 御製詩二集卷三十四《宋瓷臂擱》：「銅之壽者三代遺，宣和博古曾辨之，是時設有修內司。」

43 御製詩四集卷二十八《詠官窯碟子》：「冰裂紋有泐水滋，一例鳳凰山下土（注：宋時修內司官窯在杭之鳳凰山下）。」

44 御製詩四集卷八十一《詠官窯小瓶》：「中矩折旋 臈之，陶成北宋至今貽。」

45 御製詩五集卷二十三《詠官窯盤子》：「祇以光芒嫌定州（注：宋時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不入禁中，京師自置窯燒造，曰官窯，見老學庵筆記及留青日札中）。」

46 御製詩四集卷六十一《詠汝窯盤子》：「趙宋青窯建汝州，傳聞瑤末為油。」

47 御製詩二集卷三十四《宋瓷臂擱》：「是時設有修內司，官汝均定精為瓷。」五集卷二十一《題鈎窯碗》：「鈎窯都出修內司。」

命汝州造青窯器」的記載有關：汝窯是受朝廷命令燒青瓷，以便替代原為宮廷用器的定窯白瓷。就此一脈絡而言，若說汝窯和定窯亦屬和修內司所職司之宮廷用瓷，並無大誤。

另外，儘管今日所謂汝窯製品的認定其實頗受惠自乾隆皇帝汝瓷鑑識的啓發，而汝窯最為膾炙人口的作品無非是現藏於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和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所謂水仙盆了。水仙盆於清宮又稱貓食盆或獬食盆，依據督陶官唐英成於雍正十三年（1735）的《陶成記事碑記》以及乾隆十年（1745）造辦處檔案，其時唐英曾奉旨做燒「汝釉貓食盆」，⁴⁸似乎認為水仙盆屬汝窯製品。然而不知何故？多年之後，乾隆皇帝於二十六年（1761）和四十三年（1778）再次為詩判定其內廷收藏的貓食盆（水仙盆）時則主張其應是宋代官窯即修內司窯製品（圖 25）。⁴⁹到底是乾隆皇帝官、汝不分？抑或只是其自身糾正此前的誤判？此仍有待釐清。

（三）近代學界之汝窯確認始末

雖然《筆衡》所載北宋朝廷曾「命汝州造青窯器」（文獻 3）是學界耳熟能詳的常識，不過，汝窯作品的確認其實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過程。簡單說來就是：在 1930 年代汝窯田野調查之前的作品比定都是屬於文獻史料的對比臆測，比如說英國 Eumorfopoulos, G. (1923),⁵⁰ Hetherington, A. L. (1924)⁵¹或 Hobson, R. L. (1926)⁵²等人即是從文獻相關記載推定汝窯應是以高溫燒成之胎質緻密的青瓷，而流傳於世的所謂影青（青白瓷）正符合此一要件，因此汝窯即影青。⁵³至於汝窯窯址的田野調查則要歸功於奉大谷光瑞之命以《汝州全志》為線索，於 1931 年走訪臨汝縣古瓷窯址的日本西本願寺僧人原田玄訥。

48 張發穎等，《唐英集》，頁 951；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頁 254。

49 御製詩四集卷十六《詠官窯盆》：「官窯原出宋，貓時卻稱唐（注：俗謂此器為唐宮貓食盆，然大內今已有三個，識為宋官窯製也）。」三集卷九《獬食盆》：「實宋修內司窯器也，俗或謂之太真獬食盆，戲題。」兩詩分別做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和四十三年（1778）。

50 George Eumorfopoulos, Ju Ying Ch'ing and Yao Ch'ai,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II, pp. 24-28.

51 A.L. Hetherington, *The Early Ceramic wares of China*, pp. 69-70.

52 R. L. Hobson, *The Catalogue of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of Chinese, K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vol. II, pp. 3-5.

53 原文次郎，〈影青器と汝窯とに關する諸説〉，頁 7-26 參照。

原田氏於臨汝縣張葉里、古一里和歸仁里等古窯址所採集到的標本計有青瓷以及施加白化妝土之磁州窯類型白瓷。青瓷又可區分為兩類：A 類是多施罩橄欖色青釉，且常見印花、劃花紋飾；B 類則是施罩鈎窯般之青釉，個別標本圈足內底施滿釉以支釘支燒而成。⁵⁴如果將上述兩類標本還原對照到學界各說，則 A 類標本即歐美學界所謂的「北方青瓷」，或中國鑑藏界為便於區隔南方處州（麗水縣）龍泉青瓷所採行之「北麗水」、「北龍泉」呼稱。至於 B 類標本相當於鈎窯或歐美人士所稱之官鈎。⁵⁵另外，自原田氏臨汝縣調查發現以來，日本和中國的鑑藏界有時又將「北方青瓷」、「北方麗水」等 A 類青瓷逕稱為「臨汝窯」或「汝窯」。此後要到 1950 年代陝西省耀州窯址發現之後，遂又將這類作品概括成所謂的「耀州窯系青瓷」或「耀州窯類型」。

從研究史看來，企圖全面解決文獻中的汝窯和清宮傳世汝瓷的關鍵人物無疑是參與籌備 1930 年代故宮文物赴英展覽的戴維德爵士。儘管戴維德之有關汝瓷外觀及其性質的掌握，其靈感主要是來自清宮傳世汝瓷上所鐫刻的乾隆御製詩文，以及一件刻有「大觀元年歲次丁亥三月望日將作少監監設汝州瓷窯務蕭服視合青泐初試火照」的著名贗品（圖 26），⁵⁶而 1936 年亦即戴維德發表其著名之汝窯論的前一年，由原清室善後委員會成員之一洪憲御窯督陶官郭葆昌主編的《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錄》之有關清宮汝瓷的判定，⁵⁷應該也對戴維德的論點多有啟發。然而，戴維德鉅細靡遺地檢討了自北宋《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至清代甚至民國時期相關文獻之汝窯記事及版本學問題，最後回歸至具體作品之胎、釉特徵和燒造技法，其研究既深且廣，可說是集汝窯研究之大成，故其所比對出的一批以細小支釘支燒而成的天青釉所謂汝官窯，已然成為此後學界之共識，影響及於今日（圖 27、28）。附帶一提，關於上述汝州瓷窯務蕭服火照，由於《宋史》（卷三四八）〈列傳〉（一百七）「沈畸傳」附有蕭服傳，稱其任職於將作監，而沈畸又曾同蕭服代蔡京治蘇州錢獄，時空背景一切合情入理，從而可知是精心設計且是以學者為獵物的假古董，也難怪戴

54 中尾萬三，〈支那汝窯に就いてホブソン氏に與ふる書〉；陳萬里，〈汝窯的我見〉，頁 46-56。

55 尾崎洵盛，〈汝窯考〉，頁 25-33；米內山庸夫，〈中國陶磁の結論〉，頁 51-58。

56 Margaret Medley, *Reviews on Celadon by G. St. G. M. Gompertz*, p. 645. 此參見：彭盈真，〈百年尋青——二十世紀汝窯認識論的變遷〉，頁 52。另外，由於汝州市張公巷窯標本所見支釘痕呈小圓點狀，其和蕭服銘火照有類似處，這就引起伊藤郁太郎的留意而專程赴英目驗實物，結果再次證實該蕭服銘火照，確屬贗品。參見：伊藤郁太郎，〈「北宋官窯探訪」余談〉，頁 87。

57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編，〈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錄〉。

維德在他的汝窯論文中還刻意思證蕭服其人之生平事蹟。⁵⁸

三、當今學界北宋官窯諸說

（一）新出考古資料

相對於前述研究史所示北宋官窯和汝窯等諸多說法，今日學界之北宋官窯考論則頗受惠於考古發掘資料和清人徐松輯、宋代禮部太常寺纂修之所謂《中興禮書》了。

考古資料包括窯址發覺成果和其他遺址出土標本等兩類。窯址發掘資料主要是指：（1）1980年代以來針對河南寶豐清涼寺所謂汝窯遺址的一系列調查報告和專書，後者包括：《汝窯的發現》、⁵⁹《汝窯的新發現》、⁶⁰《汝窯聚珍》、⁶¹《寶豐清涼寺汝窯》⁶²等，另外，《青磁の色彩》⁶³則是有問題意識地比較了高麗青瓷和清涼寺遺址出土的汝瓷標本；而最近《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⁶⁴更是以何者是北宋官窯為問題意識，比較了新近發掘出土的清涼寺汝窯和張公巷窯標本的一冊專題研究圖錄。在此一基礎之上，同一主辦單位又於2010年舉行名為《北宋汝窯青磁の謎にせまる》國際研討會並發行論文集。⁶⁵以及（2）汝州市張公巷窯出土標本，除零星簡報之外，另有《汝窯與張公巷出土瓷器》、⁶⁶《北宋汝官窯與汝州張公巷窯珍賞》、⁶⁷《河南新出宋金名窯瓷器特展》等⁶⁸圖錄、和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的研討會資料集⁶⁹以及前述汝窯特展圖錄各一冊。

另一方面，所謂其他遺址出土標本指的是窯址之外，出土有疑似上述清涼寺汝窯

58 Percival David, "A Commentary on Ju Ware," pp. 53-54.

59 汪慶正等，《汝窯的發現》。

6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汝窯的新發現》。

61 葉喆民等，《汝窯聚珍》。

6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

63 朝鮮官窯博物館，《青磁の色彩：韓國、中國青磁比較展》。

64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編，國際交流特別展《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圖錄。

65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國際シンポジウム：北宋汝窯青磁の謎にせまる》。

66 河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汝窯與張公巷出土瓷器》。

67 孫新民等，《北宋汝官窯與汝州張公巷窯珍賞》。

68 河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新出宋金名窯瓷器特展》。

69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汝州張公巷窯シンポジウム資料集》。

或張公巷窯的考古遺址，目前見諸報導的計有：(1) 河南寶豐窖藏汝瓷，⁷⁰ (2) 河南鄆城縣宋墓出土汝瓷碗，⁷¹ (3) 洛陽安樂宋代窖藏（圖 29），⁷² (4) 河南臨汝出土汝瓷洗兩件，⁷³ (5) 北京金墓葫蘆形執壺，⁷⁴ (6) 連雲港市海清寺阿育王塔，⁷⁵ (7) 北宋東京城內城出土的瓷片，⁷⁶ (8) 河南葉縣文集遺址瓷器窖藏出土的青瓷碟（圖 30），⁷⁷ (9) 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邸出土的青瓷標本（圖 31、32），⁷⁸茲檢討如下：

首先，從已發表的相關圖版看來，(1)、(2)、(4) 等河南省窖藏或墓葬出土的標本可能均來自同省寶豐清涼寺所燒造。(3) 和 (8) 兩處河南地區窖藏出土的作品極有可能為汝州市張公巷窯製品。(5) 葫蘆形執壺係出土於北京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窩論墓，然其屬十二世紀高麗青瓷一事早已由馮先銘所指出。⁷⁹ (6) 出土於連雲港市雲臺山海清寺北宋天聖四年（1026）封閉的阿育王塔地宮之青瓷小葫蘆瓶於簡報當中援引王志敏的鑑定，認為是北宋汝窯，可惜未有清楚圖版。現經彩圖得以確認其應係陝西耀州窯青瓷。⁸⁰ (7) 東京城內城出土標本無圖片，但簡報稱該「汝瓷碗」殘片，卷唇，口沿外撇，灰青釉，青灰胎，從文字形容的外觀特徵推測，極有可能是和傳世汝瓷碗相近的作品，但仍待確認。(8) 是經正式考古發掘出土的標本，是出土於杭州恭聖仁烈皇后宅之水池遺址的梅瓶口部殘片（SC：77）以及第三層位出土的盤破片（T3③：7）。從報告書所附彩圖看來，梅瓶口沿斷面呈灰白色調，瓶口內壁積釉處有冰裂開片，但其是否確如報告書所主張之汝窯仍有待確認。⁸¹其次，依

70 趙青雲等，〈河南寶豐發現窖藏汝瓷珍品〉，頁 51-55。

71 李金立，〈河南鄆城發現一件汝窯瓷器〉，頁 20。

72 張劍，〈洛陽安樂宋代窖藏瓷器〉，頁 69-71；彩圖參見：洛陽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文物集粹〉，頁 112 圖 107。

73 李輝柄，〈略談汝窯〉，頁 82 圖 3。

74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袁進京等），〈北京金墓發掘簡報〉，圖版拾參之一。

75 連雲港市博物館（劉洪石），〈連雲港海清寺阿育王塔文物出土記〉，頁 37 圖 19。

76 開封宋城考古隊，〈北宋東京城內的初步勘探與測試〉，頁 9。

77 國家文物局主編，〈2007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頁 152 圖右中；前引《河南新出宋金名窯瓷器特展》，頁 127。此承蒙小林仁學兄教示，謹誌謝意。

78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頁 34 及彩版 43；頁 64 及彩版 96。

79 馮先銘，〈中國出土朝鮮、伊朗古代陶瓷〉，收入同氏《中國古陶瓷論文集》，頁 330。

80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7〉，圖 95。

81 該梅瓶口頸部位殘片造型和目前公布的清涼寺汝窯梅瓶造型並不相同，後者圖版可參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引《寶豐清涼寺汝窯》彩版 109 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前引《河南新出宋金名窯瓷器特展》，頁 54。另外，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小林仁則是同意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出土的梅瓶殘片是來自北方的汝窯，參見同氏，〈汝窯の謎——寶豐清涼寺汝窯址の發掘と汝窯の位置づけ〉，收入前引《北宋汝窯青瓷——考古發掘成果展》，頁 242。

據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唐俊杰的報導，則南宋臨安城遺址範圍之今饅頭山東麓萬松嶺路東段南宋地層也出土有汝窯梅瓶和圈足盤殘片。⁸²我未見實物，無從置喙，但應一提的是，恭聖仁烈遺址第三層出土的盤殘片之圈足外卷，滿釉支燒，支釘略呈團狀與汝窯常見的芝麻釘不同。由於其整體釉調和器形特徵頗似清涼寺汝瓷，所以我一度認為此一恭聖仁烈皇后宅邸出土的標本很可能來自清涼寺瓷窯，直到韓國西江大學李喜寬博士教示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所發掘的越窯低嶺頭類型當中亦見同類瓷片（圖 33），⁸³才讓我警覺到上述疑似汝窯標本很可能是浙江瓷窯生產的青瓷，但此均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證實。依據以上所謂汝瓷出土資料，至少表明清涼寺窯所燒造的青瓷通行於民間，不過，設若恭聖仁烈皇后邸宅遺址確實出土了清涼寺青瓷，那麼當可結合傳世清涼寺汝瓷所見南宋高宗德壽宮配殿劉妃所居「奉華」刻銘，實證清涼寺窯曾為南宋皇室所使用。另一方面，應予一提的是，儘管（3）洛陽安樂窖藏伴出的白瓷瓜棱罐和青白瓷斂口鉢之器式分別與吉林哲里木盟庫倫旗遼代大康六年（1080）墓（M1）⁸⁴以及內蒙敖漢旗白塔子遼代大康七年（1081）墓⁸⁵所出類品相近，然而愛知縣陶磁資料館森達也學兄提醒我伴出的一件耀州窯青瓷碗的年代或可晚至十二世紀初期。從陝西寶雞縣政和七年（1117）馬德元墓出土有類似的深刻花耀州青瓷注壺，⁸⁶我同意森氏的看法。換言之，安樂窖藏張公巷青瓷碗的相對年代有較大可能在北宋末徽宗時期，⁸⁷設若該窖藏所出青瓷碗確來自張公巷窯，則此一年代觀對於主張張公巷窯即北宋官窯的論者將有正面的意義。

（二）有關北宋官窯比定的幾種手法

82 唐俊杰，〈汝窯、張公巷窯與南宋官窯〉，收入《北宋汝窯青磁の謎にせまる》，頁 64。

83 沈岳明，〈修內司窯的考古學觀察——從低嶺頭談起〉，彩版 2 左下。另外，依據近年中國方面對於低嶺頭類窯和北方汝窯標本胎釉成分分析，初步認為低嶺頭窯標本與汝窯釉的成分相近，有可能是借用了汝窯瓷的配方。參見：朱守梅等，〈南宋低嶺頭窯青瓷與傳統越窯青瓷和汝瓷關係研究〉，頁 91-94。

84 吉林省博物館等（陳相偉等），〈吉林哲里木盟庫倫旗一號遼墓發掘簡報〉，頁 15 圖 25。

85 敖漢旗文化館（邵國田），〈敖漢旗白塔子遼墓〉，圖版拾之 3。

86 王紅武，〈陝西寶雞縣縣功公社陳家嘴大隊出土一批宋代文物〉，頁 89 圖 2 之 4。

87 依據張公巷窯地層堆積和伴出遺物，郭木森一方面認為張公巷窯青瓷的年代「可能早到北宋末年，晚到金代」，同時又主張「不早於北宋末年」，故「更傾向於張公巷窯的燒造時間可能晚至金代」。參見同氏，〈汝州張公巷年代的相關研究〉，收入前引《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頁 22-31。與此相對，秦大樹則批判了郭氏的年代觀，認為張公巷窯的年代約在金代後期到元代前期，亦即十二世紀後期至十三世紀。參見：秦大樹，〈宋代官窯的主要特點——兼談元汝州青瓷器〉，頁 68-70。

如上所述，有關北宋官窯建置的宋代文獻只有兩筆，而宋元時期汝窯記事亦僅十餘條。其次，相關瓷窯考古則包括河南寶豐清涼寺窯和汝州市張公巷窯，至於疑似汝窯類型標本的出土例亦極零星。在此，我想提請讀者留意的是，儘管有關北宋官窯的文獻記事或考古資料極為有限，但卻是當今學界所擁有的全部資料，而各種北宋官窯的推論即是在此一近於窘迫的狀況下所進行的。這也就是說，依據上述資料，北宋官窯之比定只能有以下幾種方式：

- A. 北宋官窯是設立於京師即汴京的瓷窯，窯址尚未發現，故作品實態不明。不過，在清宮傳世今日所謂汝窯或官窯瓷當中或許包含了這類作品？
- B. 北宋官窯即清涼寺汝窯。由於《筆衡》、《雜錄》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文獻 3、4）的記載，《老學庵筆記》也說：「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文獻 5），所以持 B 說者，往往又認為北宋官窯是在汝州民窯的基礎上轉型而成的。這也就是說：宣政年以前的清涼寺汝窯只是奉朝廷之命燒造貢瓷的民窯，但宣政年或之後的清涼寺窯則為官方的專屬瓷窯。由於今日汝瓷之外觀確認基本來自乾隆朝的比定，當時已將北宋官窯誤植為所謂的汝窯而影響至今（圖 34、35）。
- C. 北宋官窯即汝窯，其窯址在今清涼寺一帶。
- D. 北宋官窯即汝州張公巷窯。（圖 36）

我想強調指出的是，以上四種網羅當今學界的北宋官窯推論方案，竟無一說可以證實或證偽。另外，保守或說未雨綢繆型的學者也可採用複選方式，以便迎接今後可能出現的各種考古發掘資料，也因此 B、C、D 說論者當中不排除潛藏著 A 說持論者。其次，認為張公巷窯係承續清涼寺窯燒窯制度的學者則可以複選 C、D 或者集 B、C、D 等各說於一身。從研究史看來，個別推論方案其實由來已久，而當今學者的說法和早已存在舊說的最大不同之處只是在於前者擁有稍多的考古發掘資料罷了。

將北宋官窯的燒造地點匡限於汴京的 A 說論者顯然堅信《筆衡》、《雜錄》所載「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之「京師」即汴京，也就是今天的開封。清嘉慶二十年（1815）藍浦著《景德鎮陶錄》「官古器」條（卷二）說：「宋之汴、杭官窯」即明確地道出所謂汴京官窯。明代晚期王世懋《窺天外乘》載：「宋時窯器以汝州為第一，而京師自置窯次之」，也是將「京師」做為地理位置來理解。相對而言，B、C、D 說持論者只能想盡辦法來說明所謂的「京師」是指朝廷或政府。

B 說和 C 說可以清涼寺窯址的發現來做為研究史的分捩點，陳萬里和傅振倫屬 B 說前一階段的含蓄提示者，⁸⁸李剛和李輝柄是 B 說後一階段的鼓吹者，⁸⁹而 David, P. 則是 C 說的知名倡導者。⁹⁰D 說也可以以汝州市張公巷窯的發現來區分研究史的兩個階段，在窯址尚未證實之前，將存世此類標本比附為北宋官窯的有 1950 年代的 G. St. G. M. Gompertz、⁹¹1990 年代的 Regina Krahl⁹²和上海博物館的汪慶正、陸明華等人。⁹³窯址發現之後的 D 說持論者，則要以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名譽館長伊藤郁太郎之不遺餘力的提倡最為令人印象深刻。⁹⁴

除了前述「京師」例之外，各文獻記事往往也會因持論的立場而出現不同的判斷或說不得不的解釋。比如說，《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的和高麗翡色青瓷相類的「汝州新窯器」，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舊窯到底何指？即會因持論立場而有不同的指涉。簡單說來，對於 A、C 說而言，「汝州新窯器」可以是指汝州窯（清涼寺窯或張公巷窯），而於 B 說而言，可以是汝州市張公巷窯或宣政後的清涼寺官窯，至於 D 說，而還可區分為二派，認為張公巷窯為北宋官窯但非汝窯者，其時的「汝州新瓷器」是指清涼寺汝瓷，認為張公巷窯為北宋官窯同時為汝窯者，「汝州新窯器」則可以指張公巷窯本身。那麼，與「汝州新窯器」相對應的舊窯器又如何呢？看來 A、B、C、D 四說都有越窯和耀州窯的選項，但 B 說則多出宣政前貢瓷階段汝窯的選項，此時「汝州新窯器」指的是轉型成官窯的汝州新窯。另外，D 說當中認為張公巷窯同時為汝

88 陳萬里，前引〈汝窯的我見〉。陳氏在宮中用汝州所燒青窯器的時間約於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徽宗崇寧五年（1106）之間的基礎之上，認為「政和宣和之間正式燒造官窯瓷器，也就是先為宮中燒造青瓷器的技工所主持」（頁 50）。由於陳氏並未明示北宋官窯乃是設立於汝州之青窯場，故該一提示也可以解讀成窯工集團的移動，致使此一提示略顯曖昧。相對的，傅振倫的態度則頗為明確，參見：傅振倫，〈談宋汝窯〉，收入同氏《中國古陶瓷論叢》，頁 51-56。

89 李剛，〈論宋代官窯的形成〉，收入同氏《古瓷新探》，頁 91-105；李輝柄，《宋代官窯瓷器》，頁 11-52。另外，李剛近年進一步主張汝窯是汝州境內燒造御用青瓷窯口的統稱，其包括汝州府監管（清涼寺窯）和朝廷掌控（張公巷窯）等兩類窯場，張公巷窯即「汝州新窯」，亦即北宋朝廷所設的官窯。參見同氏，〈宋代官窯續論〉，收入《古瓷談薈》，頁 152-153。

90 Percival David, "A Commentary on Ju Ware," pp. 53-54.

91 G. St. G. M. Gompertz, *Chinese celadon wares*, p. 101.

92 Regina Krahl, "The Alexander Bowl and the Question of Northern Guan Ware," pp. 72-75.

93 汪慶正，〈宋官窯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頁 124-126；及同氏〈老虎洞南宋修內司官窯遺址的重要發現及其相關諸問題〉，頁 368-380；陸明華，〈兩宋官窯有關問題研究〉，頁 328-344。

94 伊藤郁太郎，〈北宋官窯探訪〉，頁 61-76；前引〈「北宋官窯探訪」余談〉，頁 86-92。以及〈試論汝州張公巷的活動年代〉，收入前引《汝窯與張公巷出土瓷器》，頁 219-227。不過，同氏的倡議已有鬆動的跡象，近年的論文比較偏重強調不應全盤否定張公巷窯係北宋官窯的可能性。參見同氏，〈汝州張公巷窯私論〉，收入前引《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頁 250。

窯者，則可將清涼寺窯視為與之相對的舊窯。

當然，學界亦存在不願於論文中針對北宋官窯表態的隱性族群，不過我們或可觀察其對於汝瓷燒造年代之推測，而間接得知其立場，比如說認為汝窯成立於宣政年間者，很有可能即 B 或 C 說持論者。至於蔡玫芬在其近年一篇優秀的論文中談及宣政間汝州貢瑪瑙之事，同時認為「京師」未必指狹義的汴京，⁹⁵即是以迂迴的方式表述出其為 B 說或 C 說的立場；中尾萬三也是以類似方法表明汝窯為官窯的早期學者之一。⁹⁶就此觀看角度而言，長谷部樂爾近著也透露出其屬 B 或 C 說持論者，⁹⁷亦即 1980 年代傅振倫、李剛或者說 1950 年代陳萬里說法的繼承。

小結——從越窯、定窯、汝窯到北宋官窯

就宋代陶瓷史事而言，早在吳越錢氏降宋的太平戊寅年（978 年）之後不久的太平興國七年（982），宋太宗即派遣殿前承旨趙仁濟赴越州監理瓷窯務，其事見於宋末元初周密《雲煙過眼錄》（卷下）所記百衲琴銘文，即：

「李公略收雲威百衲琴，雲和樣，內外皆細紋，腹內容三指，內題，太平興國七年歲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監越州瓷窯務趙仁濟（今傳《雲煙過眼錄》記為「監杭州瓷窯務」，但《說郛》本周密《志雅堂雜抄》仍記「越州」），再補修進入，吳越國王宮百衲雷威琴，極薄而輕，異物也。」⁹⁸

雖然，愛宕松男認為所謂「越州瓷窯務」只是職司瓷器稅的稅務機關，不能據此做為判定越州官窯存在的依據。⁹⁹而宋初以供奉官、殿直、承旨為三班使臣，隸屬兵部宣徽院；從三班使臣的初任官一般是職掌商稅務，專賣場務之監當官，¹⁰⁰可以推測派赴監越州瓷務的殿前承旨確實可能具商稅務使的職權。但是，殿前承旨雖僅為低階武官，卻是天子的心腹耳目，掌握行政實權，並扮演郎黨的功能，監督地方中

95 蔡玫芬，〈論「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確性及十二世紀官方瓷器之諸問題〉，頁 82 等。

96 中尾萬三，〈支那汝窯に就いてホブソン氏に與ふる書〉，頁 20-23。

97 長谷部樂爾，〈南宋官窯窯址採集陶片について〉，頁 17。

98 小林太市郎，〈東洋陶瓷鑑賞錄：中國篇〉，頁 146-147；周密，《雲煙過眼錄》。

99 愛宕松男，〈宋代、陶瓷器産業の成立とその發展（上）〉，頁 35-36。

100 梅原郁，〈宋代の武階〉，頁 227。

央政策的施行，是確立宋代中央極權和獨裁體制的一大支柱。¹⁰¹看來，趙仁濟除可能被賦予瓷窯商稅史的職掌之外，或許還兼具視察瓷窯生產、規範陶瓷造型紋飾等窯務事宜，而上林湖越窯址發現的與「太平戊寅」款陶瓷作風一致且底刻「官」、「官樣」字銘的標本（圖 37），¹⁰²應可視為是宋初朝廷「制樣需索」¹⁰³的具體例證。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留意到河南省鞏義市北宋咸平三年（1000）宋太宗趙光義妃、眞宗趙恆生母元德李后陵出土的優質陰刻龍紋越窯青瓷（圖 38）。不僅如此，李后陵同時伴出了三十餘件多數飾有鳳紋的定窯白瓷，後者又有半數底刻「官」款，可說是具體而微地道出做為天子象徵的龍和做為帝后圖騰的鳳於皇陵中的組合。¹⁰⁴從前引《宋會要稿》所載宣和七年（1127）詔令罷減「中山府甕中樣矮足裏撥盤龍湯盞一十隻」，可知定窯亦曾燒瓷進貢朝廷。然而地方窯場燒瓷貢入朝廷並不同於朝廷設官監置具有壟斷性質的官窯，因此，北宋越窯是否具有官窯性質？仍有許多商榷的空間。不過，我們應該留意戴維德爵士舊藏的一件精美的越窯青瓷盤，該盤盤心陰刻鳳紋，外壁飾浮雕蓮瓣，滿釉以泥點支燒而成，外底心陰刻「永」字（圖 39）。¹⁰⁵如果依據越窯窯址調查資料，則該類標本的相對年代約於第三期，亦即北宋早期（960-1022），吳越國晚期至北宋眞宗時期。¹⁰⁶北京遼統和十五年（997）韓佚夫婦墓出土的底刻「永」的優質越窯執壺也可做為「永」款越器年代的參考（圖 40）。¹⁰⁷就窯址出土標本而言，已如報告書指出凡刻有「永」款等標本胎釉均極精良，且造型規整，紋飾結條流暢，甚至還出土了我認為可能是「永」款陶瓷專屬的帶有「永」款的 M 型匣鉢。¹⁰⁸

那麼，「永」款到底有何特殊意涵呢？衆所周知，分佈於河南鞏縣西村、芝田、孝義和回郭鎮的北宋帝陵，是北宋除了徽宗趙佶、欽宗趙恆被金兵俘虜客死五國城

101 友永植，〈唐、五代三班使臣考——宋朝武班官僚研究 その（一）〉，收於氏著，《宋代社會と文化》，頁 59。

102 慈溪市博物館，《上林湖越窯》，頁 51 圖 23 之 1、2，頁 93 圖 49 之 7、8 以及彩版 3 之 11、11 之 3。

103 莊季裕，《雞肋編》：「處州龍泉縣……又出青瓷，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廷制樣需索，益加工巧。」

104 孫新民，〈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發掘報告〉，頁 38 圖 16 之 1 等。

105 R. L. Hobson, *A Catalogue of Chinese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 p. 39.

10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龍口越窯址》，頁 350。

107 黃秀純等，〈遼韓佚墓發掘報告〉，圖版拾捌之一。

10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龍口越窯址》，頁 369。

（今黑龍江依蘭縣）之外，其餘七個帝王以及趙匡胤父趙弘殷所謂「七帝八陵」皆葬於此，再加上附葬於塋區的后妃、皇族或功臣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陵墓群，而所有陵墓，包括前引出土越窯青瓷的太宗元德李后的永熙陵在內，均以「永」字起頭命名，甚至於金人將崩於異鄉的徽宗梓宮送還南宋王朝葬於會稽上亭鄉，陵名亦曰「永佑」，結合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之父趙弘殷原稱「安陵」，至真宗時亦更名為「永安陵」一事，¹⁰⁹不難推知「永」字在宋代皇室中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也因此我個人多年以來始終相信「永」款越器的官用性質，並且認為「永」款越器所見龍、鳳等紋飾極有可能就是官方所規範的所謂官樣圖紋。¹¹⁰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由朝廷制樣命地方瓷窯燒瓷進奉似乎是北宋時期慣常的舉措，除了前述定窯、耀州窯、建窯等之外，《宋會要稿》（食貨五二之三七）「瓷器庫」也記載朝廷所收藏、使用的陶瓷至少包括明州、越州、饒州、定州以及青州的白瓷。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說：「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應該只是說明內廷對於青瓷的興趣要多過白瓷罷了。因此，儘管從文獻記事而言，我們可以觀察到北宋立國以來曾刻意規範制樣由越窯、定窯、汝窯等瓷窯燒造官用陶瓷，但上述諸窯仍非現今學界約定俗成的狹義官窯。

另一方面，對於 B 說持論者而言，清涼寺窯址所見政宣年間之前標本因受金銀器影響，故器式與越窯青瓷相近一事，正是汝窯在成為官窯之前燒瓷進貢的最佳例證。而清涼寺窯和張公巷窯似有將瓷器廢品集中掩埋的處理方式無疑也會讓人與官窯制度產生連想。其次，臺灣和中國兩間故宮的傳世品目前還未能識別出有別於南宋官窯青瓷的所謂北宋官窯作品，卻見不少所謂傳世汝瓷，此一現象亦值得留意。我個人是 B 說持論者，所以再想舉一個例子來補強清涼寺窯即北宋官窯的可能性。那就是韓半島黃海道峰泉郡円山里青瓷窯址曾經出土帶有「淳化三年壬辰太廟第四室享器匠王公佶造」銘文的青瓷豆等祭器（圖 41）。由於高麗朝太廟成立於第六代王成宗朝，據說其是依據甲子博士壬老成於成宗二年（983）由宋朝攜回《太廟堂圖》建成於成宗十一年（993）。考慮到其同時攜回的還有《祭器圖》一卷，故不排除円山里窯址所出祭器標本之原型是來自北宋的祭器；1980 年代湖巖美術館發掘龍仁郡西里窯所出土呈外方內圓和外圓內方並配置有龜紐蓋的祭器簠（圖 42）和簋一事，

10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頁 6-8 及頁 10。

110 謝明良，〈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及相關問題〉，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頁 295-301。

也說明了十世紀中後期至十一世紀初期韓半島禮器器式是來自叡崇義完成於北宋建隆三年（962）並獻呈太祖的《新定三禮圖》（圖 43）。¹¹¹不過，當北宋徽宗以《重修宣和博古圖》為新定禮器，並於政和七年（1117）頒賜高麗王朝，韓半島亦一改此前燒製三禮系統祭器而於十二世紀燒造博古圖系統的青瓷（圖 44）。¹¹²由於高麗青瓷往往是北宋官用器式的側寫，所以高麗青瓷的樣式有可能是復原北宋官窯器式的重要線索，而部分清涼寺窯址標本與高麗青瓷相近一事也因此令 B 說論者感到振奮，而兩者之原型可能又來自博古圖所載器式（圖 45、46）。當然，B 說論者也不會忘記目前所見南宋官窯器式有的和清涼寺作品相近的現象，因為此乃南宋官窯「襲故京（或徽宗）遺制」之證。

111 南秀雄，〈円山里窯跡と開城周邊の青磁資料〉，頁 113-116。

112 謝明良，〈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原載《故宮文物月刊》，收入前引《中國陶瓷史論集》，頁 172-189。

(表一)

編號	北宋汝窯品名	收藏地	詩文集紀年	詩文題名
1	「天青天紋橢圓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26 (1761) 辛巳	「獨食盆」
2	「粉青橢圓水仙盆」(足缺)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26 (1761) 辛巳	「獨食盆」
3	「粉青橢圓水仙盆」(銅釦)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26 (1761) 辛巳	「獨食盆」
4	「天青圓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54 (1789) 乙酉	「戲題官窯盤子」
5	「粉青圓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44 (1779) 己亥	「詠汝窯盤子」
6	「汝窯青釉筆洗」	羅桂祥	乾隆 44 (1779) 己亥	「詠汝窯盤子」
7	「粉青圓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51 (1786) 丙午	「詠官窯盤子」
8	汝窯圓洗	大英博物館 (原 PDF 藏)	乾隆 44 (1779) 己亥	「詠汝窯盤子」
9	「天青洗」	北京故宮博物院	乾隆 40 (1775) 乙未	「題官窯碟子」
10	「粉青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38 (1773) 癸巳	「詠官窯盤子」
11	「粉青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40 (1775) 乙未	「詠官窯盤」
12	「粉青盤」(底足銅釦)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45 (1780) 庚子	「詠官窯盤子」
13	汝窯盤	大英博物館 (原 Eumorfopoulos 藏)	乾隆 44 (1779) 己亥	「詠汝窯盤子」
14	汝窯盤	大英博物館 (原 Eumorfopoulos 藏)	乾隆 59 (1794) 甲寅	「題汝窯盤子」
15	「卵青碟」(口銅釦)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40 (1775) 乙未	「題官窯碟子」
16	「汝窯三足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	乾隆 45 (1780) 庚子	「詠官窯三足洗」
17	「粉青膽瓶」(口沿、圈足鍍金釦)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47 (1782) 壬寅	「詠官窯溫壺」
18	「奉華」紙槌瓶(口銅釦)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44 (1779) 己亥	「詠汝窯餅」
19	「粉青紙槌瓶」(口磨)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41 (1776) 丙申	「題官窯餅」
20	敞口碗	大英博物館 (原 PDF 藏)	乾隆 51 (1786) 丙午	「題均窯碗」
21	敞口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	乾隆 44 (1779) 己亥	「詠汝窯碗」
22	鈞窯天藍窯紫斑如意枕	國立故宮博物院	乾隆 41 (1776) 丙申	「詠汝窯瓷枕」

鐫刻於作品的御製詩所見干支銘之年代多要略早於詩文集，本文以詩文集干支銘為基準。

編號 1-21 為汝窯，22 為鈞窯。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

（元）脫脫等，《宋史·地理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

（清）王士禎，《香祖隨筆》，臺北：廣文書局，1968。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清）高宗撰，《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 068-194-586，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張發穎等，《唐英集》，瀋陽：遼瀋書社，1991。

朱家潛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二、近人論著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19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中國收藏家協會編輯委員會編，《北京故宮博物院盛代菁華展》，臺北：藝聯國際公司，2003。

王紅武，〈陝西寶雞縣縣功公社陳家嘴大隊出土一批宋代文物〉，《文物》，1981 年 8 期。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袁進京等），〈北京金墓發掘簡報〉，《北京文物與考古》，總 1 期，1983。

伊藤郁太郎，〈試論汝州張公巷的活動年代〉，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窯與張公巷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吉林省博物館等（陳相偉等），〈吉林哲里木盟庫倫旗一號遼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 年 8 期。

朱守梅等，〈南宋低嶺頭窯青瓷與傳統越窯青瓷和汝瓷關係研究〉，《考古與文物》，2008 年 5 期，頁 91-94。

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其相關的問題〉，《故宮學術季刊》，22 卷 2 期，2004 年冬季，頁 133-166。

李金立，〈河南鄆城發現一件汝窯瓷器〉，《考古與文物》，1992 年 3 期，頁 20。

李剛，〈論宋代官窯的形成〉，原載《東南文化》1989 年 6 期，收入同氏《古瓷新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李剛，〈宋代官窯續論〉，收入《古瓷談薈》，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

李輝柄，〈略談汝窯〉，《文物》，1986 年 12 期。

李輝柄，《宋代官窯瓷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 李輝柄，《兩宋瓷器》（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
- 沈岳明，〈修內司窯的考古學觀察——從低嶺頭談起〉，《中國古陶瓷研究》，第4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
- 汪慶正，〈汝窯新議〉，《河南鈞瓷汝瓷與三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 汪慶正，《汝窯的發現》，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
- 汪慶正，〈宋官窯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文物考古論叢：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香港：敏求精舍、兩木出版社，1995。
- 汪慶正，〈老虎洞南宋修內司官窯遺址的重要發現及其相關諸問題〉，《上海博物館館刊》，第8期，2000，頁368-380。
- 周密，《雲煙過眼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昌彼得，《說郭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林柏亭主編，《大觀：北宋汝窯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
-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汝窯的新發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鈞臺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木森），〈河南汝州市東溝瓷窯址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9年2期，頁12-33。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汝窯與張公巷出土瓷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出宋金名窯瓷器特展》，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2009。
- 洛陽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文物集粹》，北京：朝華出版社，1990。
- 香港市政局主辦、香港藝術館分館茶具文物館籌劃，《出藍寶色浮：羅桂祥基金捐贈中國陶瓷》，香港：香港市政局，1995。
-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編，《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孫新民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88年3期，頁19-47。
- 孫新民等，《北宋汝官窯與汝州張公巷窯珍賞》，北京：長城出版社，2009。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龍口越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秦大樹，〈鈞窯三問——論鈞窯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5期，頁80-92。
- 秦大樹，〈宋代官窯的主要特點——兼談元代汝州青瓷器〉，《文物》，2009年12期，頁68-70。

- 國立故宮博物院，《景印祕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石渠寶笈（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 國家文物局主編，《2007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 7》，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 張劍，〈洛陽安樂宋代窖藏瓷器〉，《文物》，1986 年 12 期，頁 69-71。
- 敖漢旗文化館（邵國田），〈敖漢旗白塔子遼墓〉，《考古》，1978 年 2 期。
- 深圳市文物考古鑑定所，《「官鈞」瓷器研究》，深圳：文物考古鑑定所，2006。
- 莊季裕，《雞肋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連雲港市博物館（劉洪石），〈連雲港海清寺阿育王塔文物出土記〉，《文物》，1981 年 7 期。
- 郭木森，〈汝州張公巷年代的相關研究〉，收入《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大阪：財團法人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2009。
- 郭葆昌，《清高宗御製詩詠瓷詩錄》，收入桑行之等編，《說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頁 295-323。
- 郭葆昌校注，福開森參訂，《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北平：蟬齋書社，1931。
- 陳萬里，〈汝窯的我見〉，《文物參考資料》，1951 年 2 期，頁 51。
- 陸明華，〈兩宋官窯有關問題研究〉，《上海博物館館刊》，第 8 期，2000，頁 328-344。
- 傅振倫，〈談宋汝窯〉，原載《中國文物報》1988 年 16、17 期，收入同氏《中國古陶瓷論叢》，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
- 彭盈真，〈百年尋青——二十世紀汝窯認識論的變遷〉，《故宮文物月刊》，第 287 期，2007 年 2 月，頁 46-55。
- 開封宋城考古隊，〈北宋東京內城的初步勘探與測試〉，《文物》，1996 年 5 期。
- 馮先銘，〈河南省臨汝縣宋代汝窯遺址調查〉，《文物》，1964 年 8 期，頁 20。
- 馮先銘，〈中國出土朝鮮、伊朗古代陶瓷〉，收入同氏《中國古陶瓷論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 黃秀純等，〈遼韓佚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4 年 3 期。
- 慈溪市博物館，《上林湖越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 葉喆民等，《汝窯聚珍》，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 趙青雲等，〈河南省禹縣鈞臺窯的發掘〉，《文物》，1975 年 6 期，頁 63。
- 趙青雲等，〈河南寶豐發現窖藏汝瓷珍品〉，《華夏考古》，1990 年 1 期，頁 51-55。
- 劉毅，〈「宣州官窯」及相關問題研究〉，《考古》，1999 年 11 期，頁 78-85。
- 蔡玫芬，〈論「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句的真實性及十二世紀官方瓷器之諸問題〉，《故宮學術季刊》，15 卷 2 期，1998 年冬季，頁 63-102。

- 謝小成，〈「宣州官窯」探微〉，《文物研究》，1995年10期，頁35-49。
- 謝明良，〈記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陶器〉，原載《故宮文物月刊》，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出版社，2005，頁172-189。
- 謝明良，〈臺灣海域發現的越窯系青瓷及相關問題〉，原載《臺灣史研究》11卷2期，收入《貿易陶瓷及文化史》，臺北：允晨出版社，2005，頁295-301。
- 謝明良，〈耀州窯遺址五代青瓷的年代問題〉，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6卷2期，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社，2007，頁55-77。
- 謝明良，〈十五世紀的中國陶瓷及其有關問題〉，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7卷2期，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社，2007。
- 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原載《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社，2007。
- 謝明良，〈東窯小記〉，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社，2008。
- 羅慧琪，〈傳世鈞窯器的時代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997年4期，頁109-183。
- ダグラス・バレット（Douglas Barrett）等編，《東洋陶磁》5大英博物館，東京：講談社，1980。
- 大谷光瑞，《支那古陶磁》，京都：陶雅會，1932。
-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汝州張公巷窯シンポジウム資料集》，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2007。
-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大阪：財團法人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2009。
-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國際シンポジウム 北宋汝窯青磁の謎にせまる》，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等，2010。
- 小山富士夫，《支那青瓷史稿》（東京：文中堂，1943），收入《小山富士夫著作集》上，東京：朝日新聞社，1977。
- 小林仁，〈汝窯の謎——寶豐清涼寺汝窯址の發掘と汝窯の位置づけ〉，收入《北宋汝窯青瓷——考古發掘成果展》，2009。
- 小林太市郎，《東洋陶瓷鑑賞錄：中國篇》，京都：便利堂，1950。
- 中尾萬三，〈支那汝窯に就いてホブソン氏に與ふる書〉，《やきもの焼味》，5卷7號，1939，頁20-23。
- 中尾萬三，〈南宋代に於ける陶磁の記文の略解 輟耕錄掲出「窯器」解〉，《陶磁》，3卷6期，1931，頁1-14。
- 友永植，〈唐、五代三班使臣考——宋朝武班官僚研究 その（一）〉，收入氏著，《宋代の社會と文化》，東京：宋代史研究會，1983。

- 出川哲朗，〈官窯タイプ鈞窯磁器の製作年代について〉，收入《鹿島美術研究》年報第 21 號別冊（2004），頁 253-261，後又中譯題名〈關於官窯類鈞瓷的製作年代〉，收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2005 中國禹州鈞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頁 86-91。
- 伊藤郁太郎，〈北宋官窯探訪〉，《陶說》，第 620 期，2004，頁 61-76。
- 伊藤郁太郎，〈「北宋官窯探訪」余談〉，《陶說》，第 625 期，2005，頁 86-92。
- 伊藤郁太郎，〈汝州張公巷窯私論〉，收入《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展》，大阪：財團法人大阪市美術振興協會，2009。
- 米內山庸夫，〈中國陶磁の結論〉，《陶說》，第 187 期，1968，頁 51-58。
- 尾崎洵盛，〈汝窯考〉，《大和文華》，第 16 期，1955，頁 25-33。
- 長谷部樂爾，〈南宋官窯窯址採集陶片について〉，收入《米內山陶片》常盤山文庫中國陶磁研究會會報，2009。
- 南秀雄，〈円山里窯跡と開城周邊の青磁資料〉，《東洋陶磁》，第 22 期，1992-94。
- 原文次郎，〈影青器と汝窯とに關する諸説〉，《陶磁》，1 卷 2 號，1928，頁 7-26。
- 唐俊杰，〈汝窯、張公巷窯與南宋官窯〉，收入《北宋汝窯青磁の謎にせまる》，大阪：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等，2010。
-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宋瓷圖錄：汝窯・官窯・鈞窯〉，東京：學習研究社，1973。
-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宋瓷圖錄：南宋官窯〉，東京：學習研究社，1974。
- 梅原郁，〈宋代の武階〉，《東方學報》，第 56 期，1984。
- 朝鮮官窯博物館，〈青磁斗色形：韓國、中國青磁比較展〉，廣州：朝鮮官窯博物館，2005。
- 愛宕松男，〈宋代、陶瓷器産業の成立とその發展（上）〉，《東北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第 24 期，1974。
- David, Percival. "Hsiang and His Album."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33-34). pp. 22-47.
- David, Percival. "A Commentary on Ju ware."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XIV, (1937), pp.18-69.
- Eumorfopoulos, G. Ying-ch'ing, Ju and Ch'ai Yao.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II, (1922-1923). pp. 24-28.
- Gompertz, G. St. G. M. *Chinese Celadon wares*. London: Faber & Faber, 1958.
- Hetherington, A. L. *The Early Ceramic wares of China*. London: Benn, 1922.
- Hobson, Robert Lockhart. *The Catalogue of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of Chinese, K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vol. II*. London: Benn, 1926.
- Hobson, Robert Lockhart.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K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Bouverie House London: Ernest Ltd, 1926.

- Hobson, Robert Lockhart. *A 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 London: Stourton Press, 1934.
- Krahl, Regina. "The Alexander Bowl and the Question of Northern Guan Ware." *Orientation*. (1993), pp.72-75.
- Medley, Margaret. Reviews on Celadon by G. St. G. M. Gompertz.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32, no.3 (1969).
- Pierson, Stacey & Amy Barnes. *A Collector's Vision: Ceramics for the Qianlong Emperor*.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2002.

Reflections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Northern Song Guan (Official) Ware

Hsieh Mi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history, this study offers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concerning research on Guan (Official) ceramic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ith respect to Song dynasty texts rela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fficial kilns in the Northern Song, only two can be found, while just a dozen or so on the Ru kilns appear in the Song to Yuan dynasties. This is followed by related kiln archaeology for the Northern Song Guan kilns, including the Qingliangsi kiln site at Baofeng in Henan and the Zhanggongxiang kiln in Ruzhou City. With these less-than-ideal conditions, it is no wonder that research on the Northern Song Guan wares is filled with speculation and questionable comparisons, with little to offer in terms of proof or evidence for support.

But are the Ru wares mentioned in Song and Yuan dynasty texts the ones we commonly refer to by the same name today? This is quit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earliest example of a surviving group of fine celadons defined as Ru ware, and for which we have illustrations to support the claim, comes from the Qianlong Empero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problem, however, is whether the decisions made by the Qianlong Emperor, which still affect our present understanding, are valid or not. Again, this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Keywords: Northern Song Guan ware, Ru ware, Baofeng Qingliangsi kiln, Zhanggongxiang kiln



圖1a 「宣州官窯」青黃釉四繫罐殘件 北宋



圖1b 「宣州官窯」青黃釉四繫罐殘件 北宋



圖2 “Alexander Bowl” 汝州市張公巷窯 大英博物館藏



圖3 耀州窯 北宋（中國陝西郃縣出土）



圖4 耀州窯窯址出土 北宋



圖5 鈞窯花盆 Fogg Museum



圖6 鈞窯出脊尊



圖7 「宣和元寶」錢範



圖8 鈞窯執壺殘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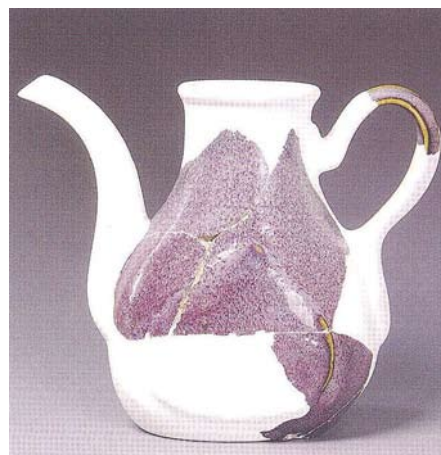


圖9 鈞窯執壺殘件



圖10 《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雍正七年「匣作」



圖11 「奉華」銘汝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陶瓷譜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a 南宋官窯龍紋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b 同上外底



圖14 《燔功彰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汝窯碟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燔功彰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汝窯橢圓洗 英國PDF藏



圖18a 鈞窯枕《刻乾隆「詠汝窯瓷枕」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b 同上底部



圖19a 汝窯紙槌瓶（口殘）（刻乾隆「詠汝窯瓶」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b 同上底部



圖20a 汝窯盤（刻乾隆「詠汝窯盤子」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b 同上外底



圖21 清倣青瓷瓶（刻乾隆「題汝窯雙耳瓶」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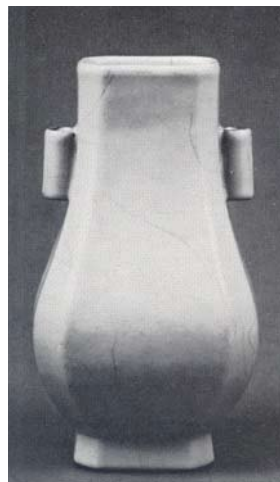


圖22 「大清乾隆年製」款清瓷瓶 大英博物館藏



圖23 汝窯碗（碗心刻乾隆「題鈞窯碗」詩） 英國PDF藏



圖24 汝窯碗（刻乾隆「詠汝窯碗」詩） 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5a 汝窯水仙盆（底刻乾隆「獼食盆」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b 汝窯水仙盆（底刻乾隆「獼食盆」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6 大觀元年（1107）汝州窯務蕭服火照
英國PDF藏



圖27 汝窯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8 汝窯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中國洛陽安樂窖藏出土張公巷窯碗



圖30 中國河南省葉縣文集遺址瓷器窖藏
出土的青瓷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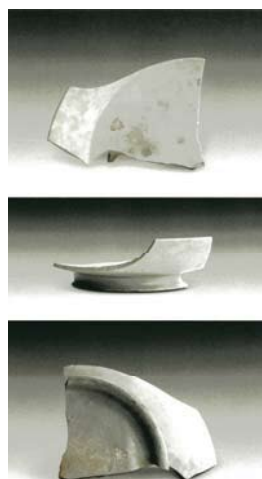


圖31 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出土青瓷盤殘片



圖32 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出土梅瓶口部殘片



圖33 南宋浙江低嶺頭類型青瓷



圖34 水仙盆 清涼寺窯址出土



圖35 紙槌瓶清涼寺窯址出土



圖36 中國汝州市張公巷窯址出土



圖37 上林湖越窯窯址出土「官樣」銘殘片



圖38 越窯青瓷龍紋洗北宋咸平三年(1000)元德李后陵出土(太宗妃、真宗生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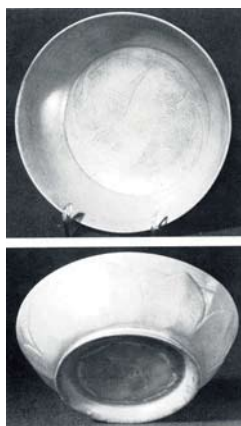


圖39 越窯「永」銘青瓷盤 英國PDF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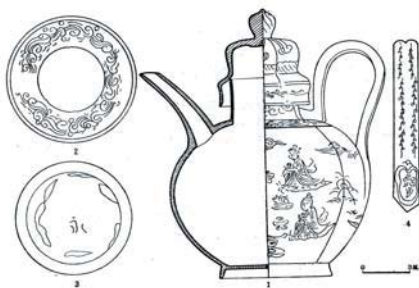


圖40 越窯「永」銘注子 北京遼統合十五年(997) 韓佚夫婦出土



圖41a 韓半島黃海道円山里窯出土太廟祭器



圖41b 同上外底



圖42 韓半島能仁郡西里窯出土「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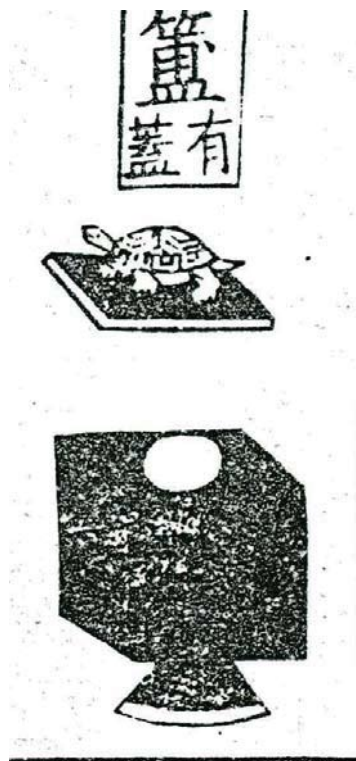


圖43 北宋建隆三年(962)《新定三禮圖》的「簠」



圖44a 高麗青瓷鼎 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藏



圖44b 《重修宣和博古圖》的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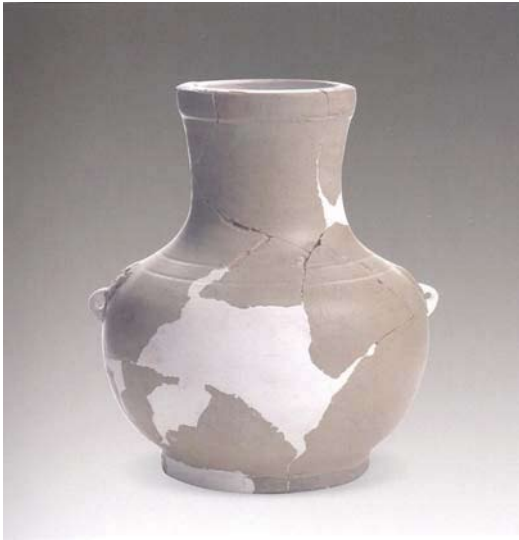


圖45a 清涼寺窯址出土圓壺



圖45b 《重修宣和博古圖》的圓壺



圖46a 清涼寺窯址出土方壺



圖46b 《重修宣和博古圖》的方壺